



邵阳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邵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1986.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邵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谢道锡

邵阳资江印刷厂印刷

*

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3×1092 1/32 印张：8.61 字数：176000

印数：1—3000册 工本费1.50元

目 录

- 蔡锷将军事略 马少侠(1)
蔡锷与隆回 李传补(15)
彭钟泽传略 李传补(17)
忆姑母邓益 邓 敏(34)
在追随尹如圭烈士从事革命的日子里 余月娥(39)
冯玉祥将军在邵阳 李春芳(46)
英国医生毕家造叙述的冯玉祥将军 唐伯福(48)
怀念抗日阵亡将士陈叔达 潘 鉴(50)
缅怀先父陈叔达 陈素心(56)
追忆父亲李伯蛟 李忠良(61)
树高千尺 叶落归根 岳 仑(64)
我与姜逸樵博士的一晤 文 强(68)
回忆戴岳先生二三事 陈新宪(71)
孙娘工传略 孙长祝(79)
五四运动的回忆及今后文艺工作者的道路
..... 孙娘工遗著(83)
对刘范猷先生的回忆 宁卓群(90)
回忆父亲刘范猷 刘元亮 刘桂君(98)
青冰的一生 伍东白(110)
石蕴山先生简况 黄叙伦(118)
先君李笏山事略 李坤鸿(121)
回忆伯父蒋志城 蒋次清(125)

回忆父亲鄢远猷教授	鄢祖帮(128)
陈心传传略	马少侨(132)
回忆父亲魏肇文先生	魏荣爵(137)
我在起义前后	荣英魁(143)
忆石略在邵阳迎解前夕	袁政德(150)
昆仑关战役的回忆	张国祥(154)
忆长春起义	宁伟(158)
绥宁县人民自卫大队投入绥宁剿匪纪要	刘继善(163)
江南别纵队夜袭武阳镇及配合大军解放	
武冈城回忆	陈正灼(175)
循程小学——革命的摇篮	姜明道(183)
塘田战时讲学院学习生活的回忆	唐甫之(193)
地下党的活动基地——团山善汉小学	禹问樵(200)
《劲报》安江办事处的回忆	禹新初(213)
关于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迁邵阳	
后情况的几点补充	禹问樵(216)
回忆湖南省会警备旅第一团	曾光炎(219)
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与旋被迁葬的日期和	
两副挽联	禹靖寰(225)
邵阳基督教会概述	李导群 陈文(230)
一场办学公案	龙得云(240)
古城医药春秋	唐伯福(242)
邵阳飞机坪的变迁	苏缙如(254)
寺庙、祠堂——早年办学的基础	杨济民 伍东白(263)
武冈匪首谢光明	许超凡(267)
编者与读者	(275)

蔡 钜 将 军 事 略

马 少 侨 *

一、学 生 时 代

蔡锷（1882—1916），原名良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邵阳县东乡亲睦乡（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蔡锷村）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里。蔡锷六岁时随父母迁居武冈山门横板桥（今属洞口县），七岁入私塾读书。后回到邵阳，得邵阳名士民主主义激进人物樊锥先生的赏识，免费收为弟子，初步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奠定了后来毕生从事民主革命事业的基础。蔡锷年十二岁考中秀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得督学徐仁铸的推荐，入资产阶级改良派南学会人倡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习。这学堂当时由谭嗣同任学监，梁启超任总教习。所倡学说，倾向民主政治。蔡锷以特出的才华为梁启超所器重，受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深。湖南巡抚陈宝箴厉精图治，变法维新，考选学生出洋留学，蔡锷以第一名入选。尚未实行，不料这年8月，西太后策动政变，杀害了维新变法的激进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日本。这时长沙时务学堂亦已被逼解散，蔡锷走武昌，欲求学于两湖书院，以系时务学堂旧生，被拒不许入校。乃赴上海考入

* 作者系邵阳市二中离休教师，现任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南洋公学学习。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春，应他的老师梁启超之招东渡日本，考入大同高等学校。加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经常在一起研究革命问题，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展开，唐才常等回国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湘、鄂、赣、皖等省分五路起义，蔡锷这时亦辍学回国，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才常等遇难；蔡锷以先期回湖南串联，未遭毒手。仍走日本，始改名蔡锷。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社工作，并积极为该报撰稿，唤醒国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在以奋翮生署名的、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的《军国民篇》一文中指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他奋然呼号：“居今日而不以军国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蔡锷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自费进成城学校习陆军，次年在联队见习期满。他的《军国民篇》就是在那时写成的。全文慷慨淋漓，表现了他唤醒全民，武装全民，以挽救祖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凡吾国读此报（指《新民丛报》）者，类能言之。倭人河边半五郎，尝刺取此篇及《新民（从）报》中蒋百里先生所著《军国民之教育》一首（篇），汇为《军事编》以示其国人。至明治末，印已七版”。足见此文的国内外影响之大。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蔡锷考入士官学校。自此以后，“即与梁党少往返，所与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1904年（光绪三十年）冬，蔡锷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在百余学生中，他

与蒋百里均名列前茅，开始以军事家的头角崭露于世。

二、回国办军事学校

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章士钊、杨笃生等在上海组织了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开展革命活动。这年冬蔡锷自日本归国，道经上海，加入了爱国协会。后来章士钊回忆说：当爱国协会成立之后，正值蔡锷由日本毕业返国，道出上海，“应吾辈之邀约，参加斯会。彼戎服莅盟，佩剑锵然，其持态严肃，为吾六十年来永矢勿谖之印象”。蔡锷回国后先在江西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旋回湖南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黄兴时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蔡经常同黄在一起密谈革命机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春，他登上岳麓山头，纵目四顾，云树苍茫，大有谁主中原之感。他写诗道：

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

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充分表达了一个革命军人的豪情壮志。这年夏，蔡锷应聘去广西，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旋又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和测绘学堂堂长等职。于是蔡锷遍邀革命党人谭人凤、曾广轼等人前往工作；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先生入他的幕府，恭执弟子之礼。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也变姓名进入广西，与蔡锷一起商讨革命方略。据好些当事人写的回忆录说，此时黄兴曾介绍蔡锷加入同盟会；谭人凤也在回忆中谈到：

“询悉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深夜与松坡……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可见从湖南到广西时的蔡锷，他纵非同盟会员，却已经与同盟会员们肝胆相照，成为

民主革命的战士了。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秋，蔡锷奉命赴河南参观秋操演习，担任中央评判官。事毕往北京，考察军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春，广西创办陆军小学，蔡锷兼该校总办，并兼兵备处会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1909年（宣统元年），奉命赴龙州任讲武堂监督，不久即迁往南宁；1910年复迁桂林，并任干部学堂监督、广西混成协协统等职。蔡锷在广西以全力训练新军，实现他的军国民主义。他说：“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蔡锷在广西约六年，行经四千里，考查山川形胜，物产民情。公而忘私，自己不名一钱。他在复曾广轼的信中说：“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奉家母回籍……除盘川外，约留三百金之谱，此居桂五六年之储蓄也”。“扪心自问，兄之对于西省，毫未吃半点冤枉饭，可以质诸鬼神者也。”

蔡锷从湖南来广西，是应广西巡抚李经羲的邀请而来的。李经羲移镇云贵总督，一再电邀蔡锷前往。蔡锷认为广西方面“虽不见十分沆瀣”，“亦未尝稍衰礼遇，若恝然舍而之他，尚不能无介介耳”。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春天，始摆脱广西工作，前往云南。从此叱咤风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辛亥“重九”起义

蔡锷初到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感到“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便暗中部署力量。这年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统领。黄兴对此极为高兴，在其给加拿大同盟会员的信中居然称他为“同志”，认为“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在蔡锷所统领的协中，中级军官如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等，都是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士官毕业生。下级军官中，亦有不少同盟会员。而云南讲武堂更是同盟会在昆明的活动基地。朱德同志后来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六日）武昌新军起义，点响了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炮声。九天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联络官兵，同可靠分子组成核心领导团体，预备弹药，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起初还有人心存顾虑，认为云南不宜立即举事，应候全局大定之后再宣布起义，以避免外人乘机进行干涉。蔡锷当时果断指出：云南应当迅速高举义旗，为东南各省倡导，进而戡定川黔两省，就有力量可与满清争衡。至于外人干涉，以大势言之，不必顾虑。众人多赞成其议，乃定期举事，并决定攻击

计划，歃血为盟，誓不反顾。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午后，蔡锷在昆明巫家坝领导新军誓师起义，命李根源率七十三标围攻军械局及五华山；自己亲率主力于大东门入城。入城后即派军队协攻军械局、五华山及总督署各处。起义军鏖战了一夜，因为每人仅有十五发子弹，天亮时早已射完了。起义军面临的情况是：若不及时攻下军械局，则弹药无从接济，全军有覆灭的危险。乃以火药炸毁围墙，攻克军械局，控制了全局库存的军机火药。五华山、总督署亦同时攻克。控制云南新军的北洋派人物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当场击毙，李经羲仓皇逃匿。蔡锷令饬诸军分别占领要地，不得擅离；并严饬各军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妄取民间一物。人民安堵，滇局大定。11月2日成立云南军政府，蔡锷被推选为都督。据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蔡锷“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约，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云南“重九”起义，是武昌起义以来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之后第五个独立的省份，又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独立的省份，它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响，从而迅速推翻了清朝政府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结束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

四、在“南北议和”时期

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1月27日止，全国已有十四个省

宣布独立，清政权在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在辛亥革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却面临着新的危机。在清政府方面，袁世凯握有军政大权，可以摆布清朝命运和颠覆革命武装；而在革命内部，政见上又有极大分歧。都督们有些人主张建立联邦制的国家，以维持其地方割据势力；有些人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的统一国家，但却又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倒戈一击；有些人甚至梦想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在这一局面之下，蔡锷将军的政见是鲜明的。11月15日，他在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的电文中说：“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18日，又在致各省军政府电文中更具体地提出关于中央政府的组织纲要：“一、定国名为中华，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12月25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于是群龙无首的中国政局为之一变。12月29日，聚集在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团一致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与会的十七省代表，有十六票投向了孙中山先生。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要为“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奋斗。蔡锷将军所提出的政见，与孙中山先生的政见是一致的。

但是，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在酝酿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时候，有人就企图待袁世凯来担任总统，因而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也只称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继续进行奉送革命果实的所谓“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是反对议

和的，他说：“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当时通电全国拥护革命政权、反对议和的又是蔡锷将军。1月26日，他在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文中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唯少数满清之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堕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唐绍仪）签定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但是，孙中山先生“反对议和”的主张虽然得到象蔡锷将军等革命都督们的支持，可是只要袁世凯倒戈完成反清反帝制的历史任务就由他任大总统的趋势已无可挽回。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宣布退位。民国大总统一职就在遵守《临时约法》的谎言下拱手送给袁世凯了！

五、云南讨袁起义

袁世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后，把国民政府劫迁到北京，随即撕毁《临时约法》。1913年，又打败了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主力部队，便企图恢复帝制，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时他唯一的顾虑，就是蔡锷将

军仍在云南，颇有实力，不易对付。便于这年9月，调蔡锷将军进京任职。无非是想把他监视起来，断绝他与革命党人的联系。蔡锷将军和当时其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人物一样，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南北议和时期他虽然极力反对袁世凯，但当袁世凯已窃取革命成果之后，又转而支持袁世凯，对他存在着能救中国的幻想。临行前数日他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讲话说：“现任大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但衡量中国现在的形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但当有人暗示他“袁有称帝野心”时，蔡锷将军却庄严地表示：“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此约，国人必起而共讨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

蔡锷将军到京以后，先后被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率领办事处办事员等职务。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取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随即指使杨度等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杨度多次约蔡锷将军加入筹安会，都被借故推脱。但为了避免袁世凯的猜疑，当其派人征询将军府各将军对帝制的态度时，蔡锷将军首先写下“赞成”二字。并故意与云吉班妓女小凤仙看花饮酒，放荡不羁。因此袁世凯渐渐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看待。而蔡锷将军就在袁世凯进行帝制活动的同时，一方而写书信给在美国的黄兴，表示准备南下反对帝制的决心；一方面又密电云南唐继尧，告诉他“京中现有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务望稳静”。11月中旬，蔡锷将军突然脱身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与黄兴派

来接他到日本去的张孝准于11月19日化装乘轮舟赴日本，中途转道秘密回云南。离天津前夕曾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表现了蔡锷将军不成功则成仁的大无畏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品德。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所谓各省代表的“推戴”，当了“中华帝国”皇帝。13日，在“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改总统府为新华宫，下令从1916年起改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年，宣告将于元旦日举行“登极”大典。这时蔡锷将军正在云南道上秘密前进。12月19日到达昆明，云南民心大为振奋。“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22日，蔡锷将军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讨袁问题。有些人从云南军与北洋军力量对比的悬殊上心存顾虑。蔡锷将军针对这些人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畏惧思想，以豪迈的语言阐述：“满清几百年的帝制，我们云南才一旅人，响应武昌起义，就把他摧毁了；袁世凯算什么力量？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活的，越来越大；袁世凯的力量是死的，不但不会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小。我不是空谈理论，而是根据人心，全国反对袁世凯的十之八九。希望大家把军队掌握好，我与唐继尧将军有稳妥办法，反对复辟，一定成功！”当时全体起立，高呼“赞成”，欢声如雷。次日，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限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同时通电各省。到期，袁世凯拒不作答。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通电全国，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恢复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通电指出：“今兹之举，正所以去苦害之城，臻乐利之境，除帝制

之毒，复共和之麻。但有进死，更无退生，非达到还我共和民国之目的不止。”云南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孙中山先生对此壮举，大为振奋，他致电上海革命党人说：“唐、蔡已动，……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是月，孙中山先生发表了《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爱国之豪杰共图之”。论者谓孙中山先生缔造共和，蔡锷将军再造共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六、亲统护国军入‘川作战’

云南起义开始了全国性的讨袁护国战争。云南起义军队改番号为护国军，共有三个军的编制。蔡锷将军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以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镇守云南。蔡锷将军所率领的第一军下有三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钟岳分别担任。朱德同志当时就在第三梯团任支队长。这是护国军的主力。由蔡锷将军亲自统领于1月16日入川作战。蔡锷将军入川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第二梯团向贵州毕节前进，到毕节后或北攻泸州，或东下贵阳以入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备部队。出发之前，蔡锷将军已患有不治之症，身体极为衰弱。出发之后，据1月27日写给夫人潘惠英的信说：“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每日步行约二十里，余则乘马或坐轿，饮食尤增。”但是，在艰巨的行军生活中，蔡锷将军所过的却是与士兵一致的艰苦生活。据他的侍从副官邹若衡回忆说：“蔡生活朴素，自背

饭盒，用树枝做筷子吃饭；所穿大衣，还是在日本当学生时穿的，不但很旧，而且通个大洞。我在电话里报告唐继尧后，唐派人送来一件皮氅。蔡对我说：‘何消穿这好的衣服？这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呀！’到达宿营地时，蔡的伙食仍然十分简朴。原来司令部参谋罗佩金是与蔡同桌开饭的，没有多久，罗感觉蔡的伙食过份简单，就去和参谋处的人员一道开伙了。”这样，蔡锷将军的病不是在步步减轻，而是在步步加重了。

蔡锷将军率领入川作战的护国军第一军，一共只有三百一百多人，而袁世凯直接调到前线的北洋军，就有曹锟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寿的第八师；加上四川都督陈宦所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文三个旅，总数不下三万人。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蔡锷将军身先士卒，在纳溪棉花坡一带，与曹锟、张敬尧的北洋军相遇，鏖战半月，屡创顽敌。就在这时，蔡锷将军的肝病已日趋沉重，喉咙亦嘶哑失声了。

3月7日，敌人以强兵压镇。蔡锷将军命令护国军转移大洲驿稍事休整。十天之后，又兵分左、中、右三路，向北洋军再次发动猛攻。整个川南地区，几乎已全部成为战场。护国军以少胜多，重创张敬尧的第七师，重新攻占了江安、南溪、纳溪等地。从此，北洋军疲于奔命，已无力进攻护国军。袁世凯的皇帝梦，也就噩梦频惊了。

3月22日，袁世凯已处于势孤力尽的绝境。才下令宣布取消帝制，仍自称大总统，企图保持住他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但全国反袁形势却并不因为袁世凯取消帝制的花招而缓和，仍在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崩分。接着，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